

国内高校华侨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质性研究

王蕾^{1,2}, 胡雪松³

(1. 华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2.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3. 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华侨学生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办好让侨胞满意的教育始终是高校承担国家统一战线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华侨学生因明确的国别属性与独特的成长经历使其成为既有别于国内学生又不同于华人留学生的文化群体。本研究采用实证调研方法, 借鉴安·斯威德勒的文化“工具箱”理论, 深入探讨华侨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性特征, 为进一步开展国内高校华侨学生中华文化认同路径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实证借鉴。

[关键词] 国内高校; 华侨学生; 中华文化认同; 基础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 G 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4) 03-0075-09

一、研究设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39}。我国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超过6 000万侨胞资源, 海外侨胞一直秉承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 丰富的侨胞资源是我国作为侨务大国在新时代开展统战工作的独特优势。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统战结构复杂化、统战对象思想多元的现实挑战, 华侨华人新生代逐渐成长为侨社主体, 部分新生代对祖(籍)国感情代际递减的紧迫现状是爱国统一战线建设亟需回应的时代议题。华侨学生^①作为华侨华人新生代的重要组成,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国内高校^②既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基础, 又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战略要地, 结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立足高等教育以文化人的价值取向, 深入探析华侨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特征进而面向华侨学生形塑中华文化认同意识, 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现代化发展的路径构成, 关系到党和国家统一战线事业的兴衰成败, 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圆满实现。

本研究借鉴安·斯威德勒 (Ann Swidler) 文化“工具箱”理论独特的分析视角为文化议题探讨提供理论支撑。斯威德勒提出, 文化并非通过提供终极价值来影响行动, 而是通过一系列文化资源, 如习惯、技能和风格等形成文化“工具箱”, 主体经过对情景的判断从“工具箱”中选择不同的文化资源建构日常行动策略从而生成主体的行为模式。斯威德勒文化“工具箱”理论颠覆了传统文化研究范式中认为文化对主体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观点, 强调

[收稿日期] 2024-01-03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福建高校华侨华人新生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现状及对策研究”(FJ2021C003)

[作者简介] 王蕾 (1986—), 女, 陕西西安人, 讲师,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华文化研究。

① 华侨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华侨学生”概念依照《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简章》中的界定, 指定居国外并符合一定居住时长回到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公民。

②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原则, 香港、澳门与内地依据各自不同的统计制度和法律规定, 是相对独立的统计区域。结合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高等院校招生政策、培养体系等的差异性, 本研究中的“国内高校”指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高校, 其中涉及到的数据统计亦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的高校。故, 在后文论述中, 如未做特别说明, “国内高校”与“高校”的表述均指代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高校。

作为一种形式多样的策略性资源,文化拥有独立特质。行为主体“工具箱”中文化资源的组成与性质,决定了主体构建日常行动策略的基本模式与行为特征。文化只会在主体行动过程中起到策略性的辅导作用,行为与文化之间的决定关系是或然而非必然的联系^{[2]2}。斯威德勒文化“工具箱”理论为文化与行动因果关系的分析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结合本研究华侨学生的群体特征以及构建文化认同路径的研究期待,斯氏理论将主要在以下3个方面为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提供有益借鉴。(1)从文化与行为因果关系分析角度扩展对文化要素的理解。斯威德勒认为主体通过从文化“工具箱”中选择不同的文化资源构建自身在差异化情境时“行动策略”的观点,意味着主体拥有文化资源的丰俭程度将直接关系“行动策略”构建的成立与否。在文化“工具箱”理论中文化资源的组成形式与具体类型是丰富多样的,包括语言、信仰、仪式、艺术、典礼、政策等都可以成为主体构建“行动策略”的具体“工具”,因此可以被视为文化资源的一种要素,这种对文化要素形式的扩展丰富了文化分析中对文化影响要素的涵盖范围,拓展了对文化要素研究的讨论空间,也更加符合主体在具体“行动策略”构建过程里受到多元且复杂“要素”共同塑造现实情形的阐释需要。(2)以聚焦行动策略的研究视角强调对主体行为主动性的关注。斯威德勒为了分析文化的因果作用特别聚焦于主体“行动策略”的探讨,在她看来“行动策略”就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一种持久的行动方式。文化“工具箱”将文化看作是构建“文化策略”的“工具箱”,而不是指挥利益驱动器的“扳道工”,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形象而使我们注意力转向区别于传统文化观点因果议题的尝试。(3)动态变化时期的文化分析模型适用本研究的跨文化研究视域。斯威德勒建立的两种文化影响模型分别描述了文化在稳定时期与非稳定时期所表现出对行动差异的影响效果,区分这两种文化模型的影响并澄清文化如何在这两种情况中发挥作用,也为文化解释创造了新的维度。而她对于这两种文化时期的分类恰好验证了本研究尝试论证的研究假设,即

行为主体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行为模式可能发生改变,基于这种可能性前提从而尝试构建不同的策略路径,通过塑造新的行为模式深化主体对文化本身的理解与生成认同倾向的目标。基于斯氏理论的分析框架,本研究认为华侨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性特征即表现为华侨学生在进入国内高校前拥有的文化“工具箱”的具体组成,其明确的国别属性与长期侨居国外的成长与生活经历形塑了既不同于国(境)内学生又不同于华人留学生的文化特质。本研究聚焦华侨学生独特的文化属性特征,具体探讨他们在进入国内高校之前文化“工具箱”的构成情况与特质。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3],本研究实证调研部分严格按照质性研究的调研方法与规范:(1)围绕研究主题拟定访谈提纲,主要涉及华侨学生前期的学习成长经历、回国读书的动机缘由以及在国内高校的中华文化体验感受等问题。(2)在邀请到访谈对象后,与访谈对象确定具体的访谈时间与访谈形式,访谈时长一般为60-90分钟。因为受到地域以及疫情防控等因素限制,部分访谈通过微信形式进行,并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的前提下,视具体情况采用微信视频或语音方式开展。(3)为确保访谈资料的完整性,在访谈开始之前会向访谈对象明确告知,访谈过程中希望采用录音方式进行全程记录。若访谈对象同意,则再打开录音设备进行访谈录音,辅之现场即时文字记录。若访谈者不认可录音方式,则全程采用文字方式记录访谈内容。在为期约25个月的时间内通过滚雪球抽样方法,面向国内高校49位华侨学生开展深度访谈,完成共计约70万字访谈资料的收集与初步整理工作。通过实证调研对华侨学生在进入国内高校前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氛围以及个人经历等进行深入了解,分析他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工具箱”的基本构成与特征,并尝试勾勒国内高校华侨学生的文化属性特征,同时本研究结论也属于华侨学生文化认同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为下阶段构建华侨学生中华文化认同路径研究提供支撑性论证材料。

二、见微知著的“文化休克”现象奠定华侨学生的认同心理图式

斯威德勒指出,文化如同一种风格或是一套技能与习惯,人们必须对自己想要融入的场景有一幅想象的图景,能够有能力在诸多可以选择的行动中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所以当文化共同体迁移到另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时,如果缺少了上述的这一套技能与习惯,都可能出现我们所说的文化冲击现象^{[2]7-8}。对于跨文化群体的华侨学生而言,他们是最容易遭遇文化冲击的对象,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4]状况。

(一) 接触他者文化的初次时间

在文化环境转换中主体适应是一个连续动态过程,文化差异导致以语言习惯、社会角色、价值观念等为代表的社交符号意义的短暂消失,在还未形成新的文化“工具箱”之前,主体通常在心理层面会经历排斥、接受和调整过程,严重时还会引发生理上的不适,这是主体在面对他者文化适应阶段出现的潜意识保护机制,同时也是主体最容易发生自我认同危机的阶段。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强调认同是自我发展最重要的功能,认同危机是生命周期发展动力的核心,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解决发展危机的机会,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将影响到后一个阶段是否能够健康发展^{[5]7}。

在访谈对象中,有40名华侨学生因父母工作、亲人团聚等因素前往侨居国,他们初次接触他者文化的时间都在童年期阶段(6~12岁),另有5名华侨学生6岁前已前往侨居国,除此之外,还有4名华侨学生是在侨居国出生。在访谈过程中,大多数华侨学生在谈及他们第一次前往侨居国的感受时都反馈出较为深刻的记忆。

如果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其实就是说我刚到乌克兰的两年(笔者注:9、10岁),其实我并没有怎么跟同学们交流,因为我语言不会,就是每天上下学基本上用到的就是同样的几个单词。

就是我很想说的话呀,但并不像我跟国内的孩子那样畅聊,就是我基本上每天就用那几个字还有词来表达我的一些基本的需求。我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就是从客观的角度上,还是挺无助的。(乌克兰华侨学生)^①

谈到初次前往侨居国的感受时,乌克兰华侨学生的访谈内容具有较强代表性。在访谈中他多次使用了“无助”“挫折”等词汇,可以看出,对他来说都是需要经历一个“求而不得”的尴尬期,语言、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暂时阻碍甚至终止了他的日常交往模式,这无疑对正处于确立个体与外界关系并逐渐形成自我意识的华侨学生提出严峻挑战,自我认同感与文化归属感也在此种“错位”关系确立中遭遇阻力。

对于多数华侨学生而言,他们首次接触他者文化的时间基本上是处在自我意识生成较强的童年期,这是一个从主体“中华文化”走向客体“他者文化”的转变过程,而当他们再次回到国内高校开启全新学习经历时,意味着他们又将再次经历文化环境的转变,重新回归到所属文化“中华文化”环境之中。这种内在因为“文化休克”带来的心理留痕以及外在文化环境不断转换的叠加效应,触发了华侨学生更加敏感的文化心理状态和更为迫切的文化归属期待,成为主体未来面对他者文化以及构建文化认同的基本心理图式。

(二) 应对他者文化的准备程度

主体具有区别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界限的意识,这是主体面对不同文化环境感知文化差异的认知基础。不可避免的文化冲击是否处于主体可承受范围之内,又是否会影响主体的文化适应能力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在进入他者文化环境前的准备程度。文化冲击是产生“文化休克”现象的直接因素,如果这种影响是颠覆性的则会给主体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在群体层面甚至可能引发文化冲突。

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他们当时也是很有勇气,决定辞职要出国生活,所以比较早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提到这个事情,慢慢的我也就接受

① 本研究呈现的访谈内容,字体均采用楷体输入法。访谈内容为访谈对象实际的口语化表达,未做任何修改,仅在语义不清或是可能产生语句歧义之处采用“笔者注”的方式进行说明。

了。我们当时出国的时候,我妈妈还带了很多国内的教材,在我们刚刚出去的那段时间,都是我妈妈直接在给我辅导学习。另外还请了家庭教师给我辅导语言,虽然感觉还是蛮累的,但总体上也就没有那么慌张了。(智利华侨学生)

因为我之前在国内也没有出去旅游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坐飞机是什么体验。我那次是第一次,然后完全是蒙的,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是半夜了,我妈叫我起来,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还不知道要去那边,什么都不会说。我也不知道我出去了就不能回来呀,然后我哭了还挺久的,因为真的很不习惯。(哥伦比亚华侨学生)

智利华侨学生与哥伦比亚华侨学生性别相同、年龄相仿,访谈时间上恰好具有连续性,两人前后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访谈反馈使笔者印象深刻。智利华侨学生对于初到侨居国时的感受传递出积极的情绪价值,访谈过程中时常伴随着自然的肢体动作。而哥伦比亚华侨学生在谈及当时被母亲深夜突然叫醒前往机场,再经过长途飞行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时,她所表现出的语气与态度至今都显得颇为无奈。

文化环境转换中的文化冲击难以避免,华侨学生在首次应对文化冲击时,主体是否具备充分的缓冲时间与空间成为产生“文化休克”现象及其后续影响的关键因素。主体在应对他者文化时的准备程度,既包括心理认知层面的准备,也涵盖对社交行为、文化符号掌握的熟悉程度等,相对充分的主体准备会帮助华侨学生平稳地度过由文化冲击带来的各类挑战,相反如果缺乏必要的时间与空间准备,华侨学生容易陷入迷茫无助的状态之中,直接影响他们未来再次面对文化差异时的心理调试能力。

(三) 身处他者文化的环境差异

文化记忆形态具有延续性,如果环境变化打破了主体原有文化记忆的延续性,其会因文化差异触发对文化的同一性诉求,期待通过自我调整再次与外在环境保持一致。因此,文化环境差异越大对主体文化记忆形态延续性造成的冲击越剧烈,主体呈现出的文化状态与心理可能随之受到负面影响。这种影响本身也会促使主体一定程度上丧失与外界社交的行动力从而引发“文化休克”现象。

我学校里的那些老挝学生的长辈,其实他们都是以前从中国就是打仗的时候迁过去的那些人,然后她们子子孙孙都是变成老挝国籍了。但是他们其实还是有中国的那个方言,饮食上,他们可能是更偏东南亚的口味,但是在交流方面他们还是用中文在交流吧。(老挝华侨学生)

我比较喜欢一些安静的歌,但是他们喜欢的就是那种节奏感比较快的,聊不到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会经常比如说,追剧什么的,跟他们看的剧又不一样,就是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可能关注点不太一样,像西班牙足球比较出名,大家都爱聊球赛什么的,我不感兴趣,尤其对于女孩子确实挺难沟通的。(西班牙华侨学生)

老挝华侨学生在访谈中提到,在她的生活环境中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华侨华人群体,在生活习惯、社交行为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相似性,意味着她可以将前期“工具箱”中的文化资源有效转换为现有文化资源,较好保持了文化记忆的延续性,个体文化状态的调整也趋向缓和。相比于老挝华侨学生,西班牙华侨学生就明显感受到了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在面对时空重置的境况时,所处文化环境的差异越大,主体文化记忆延续性受到的冲击就会越加强烈。这种危机感根本上来自于与他者文化的对比,文化差异的出现“倒逼”主体需要通过确认“我是谁”来破解自身的文化属性与文化归属等问题,“认同”问题本质上因为“差异”现象出现而存在。

从调研中看出,造成华侨学生“文化休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体差异加之影响因素的叠加促使笔者要以更加谨慎的研究态度审视华侨学生的心理状态,他们甚至拥有着比其他类型学生群体更为敏感的文化触觉。这种心理图式将直接影响日后华侨学生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表现出对待文化的接纳程度与应对态度,这是国内高校面向华侨学生开展中华文化认同路径探讨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

三、习焉不察的文化自觉意识形塑华侨学生的认同心理基础

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概念,强调“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应对其文化有‘自知之

明’”^[6]。华侨学生“生活在‘一定文化’中”, 应该是建立在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文化态度与文化归属问题探讨,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7]63}, 任何主体都从属于一种具体的文化类型, 中华文化是华侨学生赖以继承与传承的本源文化。华侨学生的文化自觉既体现在对于生活在多元文化背景之中的自知之明, 也表现为对自身所属中华文化的自知之明。

(一) 社会环境客观条件缺乏

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 在生活中我们通过各式各样的文化载体了解文化内涵、感知文化表达, 从而形成文化观念与文化倾向。在社会环境中各类文化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传递着主流文化的内在价值。这也意味着首先在社会环境里需要储备丰富的文化“工具”, 才有可能被主体接受、采纳并放入自己的文化“工具箱”之中, 以备在未来的行动策略建构过程中选择使用, 文化主体只有真实感知到“生活在其中的文化”的存在, 才有可能促使主体对所属文化形成“自知之明”。

文化的观念好像不太好表达吧。在阿根廷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熟悉的(笔者注: 中华文化)文化氛围, 刚刚到那边的时候, 感觉就像看动画片里一样, 就是好像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其实现在想想确实也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笑)。完全都是陌生的环境, 开始学语言, 交朋友, 平时也没什么机会再说中文或是太有中国节日的习惯了。然后现在回来读书, 我就觉得很多东西都太陌生了, 又要重新再学一遍。(阿根廷华侨学生)

阿根廷华侨学生反馈侨居国环境基本是一个全新的生活状态, 他们较少使用中文或是不再刻意铭记中国传统节日, 在侨居国的生活是一个与中华文化接触越来越少的过程。如前文所述, 理解华侨学生的文化属性不能脱离对他们多元文化环境的认知前提, 侨居国主流文化是他们日常接触的最主要也是最广泛的文化类型, 即使是在华人社会发展相对成熟的东南亚地区, 中华文化也属于亚文化种类, 而在其他地区中华文化的存在感与影响力则更显微微。

正因如此, 华侨学生与中华文化之间就维持着斥力与引力并存的动态关系。一方面, 华侨学生要尽快了解与适应侨居国的主流文化理念, 这

是作为侨居成员需要掌握的生活法则, “文化本身是一种‘适应’”^[8], 但此举从客观上延缓或阻碍了他们与中华文化之间的联系纽带。另一方面,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浸润于血脉之中的文化基因却始终相随, 华侨学生与中华文化之间维系着不可分割的亲缘连接。如果将侨居国文化环境比作是一个体量庞大的文化“仓库”, 存在于这个“仓库”中的必然是大量刻印着侨居国标识的文化“工具”。随着华侨学生侨居时长的增加, 他们从侨居国“文化”仓库中获得的文化“工具”就会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 在中华文化“工具”可能本就不丰富的前提下, 其在华侨学生整体文化“工具箱”中的总体占比也就越来越低。

(二) 教育环境集体引导缺失

华侨学生在侨居国的学习经历中, 主要接触的教育场所包括学校以及教育培训机构, 学校是文化传承与传播集中且关键的核心教育场所, 而教育培训机构作为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 在许多中国家庭的教育思维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教育组成部分。

我高中的学校, 身边 90% 都是本地人, 但是会有一些就是很少部分, 十几个中国人或者是韩国人, 在生活中周边也基本上也都是当地人。(斐济华侨学生)

斐济华侨学生的表述代表了大多数华侨学生在侨居国的学习状况, 他们的学习体验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在地化”特征, 日常接触的同学也以当地学生为主。从华侨学生接受的“在地化”学习体验反馈来看, 毫无争议的事实是基本上所有学校文化教育中都是以掌握当地文化类型、学习当地文化价值作为主要目标, 这是学校履行国家教育责任的必然结果。学校教育最显著的模式是通过集体行为的一致性与同频性来影响个人行为模式与价值判断, 个人通过集体学习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侨居国系统化的教育体制与标准化的教育模式显然无法专门针对任何“他者文化”进行学校环境中的体系化教育与引导, 相对乐观的情况是个别学校可能会将相关中文课作为选修课程纳入学校教育系统之中, 但囿于具体课时、教授内容以及课程建设等的匮乏, 很难对华侨学生中华文化意识的培养产生明显影响。如果说学

校教育是家庭教育选择中的“规定动作”，那么在多数中国家庭的教育理念里对教育培训机构取舍则可以看作是“自选行为”。

中文学校在我们那边是有的，是当地侨团开办的，我爸妈也是听朋友介绍才知道的。就是小时候在周末的时候，以前会去学一些中文，然后交一些朋友。那里什么人都有，有当地的小朋友，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华侨华裔小朋友。后来慢慢学校的事情多了，也就不再专门周末时间过去了，之后去的机会也就少了。(柬埔寨华侨学生)

值得欣慰的是，柬埔寨华侨学生在访谈中提到了关于在中文学校学习的这段经历，虽然她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未能继续参与其中，但从一个侧面反馈出部分华侨家庭是有意愿引导华侨学生在侨居国参加相关中文学习的状况。但笔者同时也感受到，他们对中文的学习明显偏向教育“补充”行为，并未对此进行系统化安排，总体学习态度与模式较为随意。

在华侨学生前期的学习经历中，如果期待他们从侨居国教育环境里能够较好地认知中华文化并汲取文化养分显然太过于理想化设定。与前文客观条件缺乏的社会环境类似，集体引导缺失的教育环境同样也无法为华侨学生接触中华文化提供助益。从侨居生活经历来看，在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层面，侨居教育环境集体引导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但是回归到华侨学生个体，在这个与中华文化渐行渐远的过程中，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了解确实是一个动态降低的过程，随之带来的是他们对中华文化自省与反思意识的逐步弱化。

(三) 家庭环境主体意识缺位

相比于社会环境与教育环境中各类不可抗力因素的客观存在，家庭环境对华侨学生而言是一个自主与灵活的空间。家庭环境是一个人“自我”概念形成的重要场域，对个人的性格养成、行为认知、价值判断等发挥深刻影响。对于跨文化群体而言，当他们的压力来自于外在快速的社会变化时，家庭是他们用来抵御外界压力的缓冲地带^{[9]54}。侨居生活期间华侨学生的家庭结构大多相对简单，多以子女与父母二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

我们家好像没有太强调吧，就是正常的生活

方式，还有饮食。我爸妈说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了解的中国东西肯定比这边人多，所以不用怎么再强调吧，也没什么意义。反而是在一些当地华人同学家，可能还会看到一些类似山水画一类的东西。(意大利华侨学生)

很多华侨学生在调研中反馈，他们在侨居国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等并未刻意强调文化意义，甚至有过国内生活经验的学生表示在侨居国的生活模式与在国内并无二致。特别如意大利华侨学生提到的情况，对比很多华人家庭，华侨家庭反而更加弱化了对于文化元素与文化意义的关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有趣议题。斯威德勒指出，在家庭生活中人们的行为规则与行为习惯总是保持一致的，在家庭生活这种稳定状态中，人们的行动模式不会出现较大差异，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独立影响力也就不再会得到有效彰显^{[2]18}。在很多华侨学生家庭中，父母辈在意识上本能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即使生活在侨居国，这种文化属性与政治身份也保持一致，因此，没有必要刻意强调所谓的“文化意义”与“文化行为”。而对于华人家庭而言，中华文化是他们在情感层面的亲情纽带，华人家庭期待从情感维度保持与祖籍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是一种文化意义层面“寻根”的表现，所以在华人群体对中华文化关注与期待方面反而体现得更为明确与具体。

通过上述对社会环境、教育环境以及家庭环境中华侨学生对中华文化认知的了解，华侨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感知与体验都被无意识的忽视了，这种忽视既来源于客观条件，又取自于主观认知，造成华侨学生失去了了解与接触中华文化的机会，在对中华文化无法产生直观感受的基础上自然无法生成对中华文化的亲切感与主动意识。在生成机制里“主动意识”产生的第一环节即被忽视的文化自觉，使随之生成的“积极了解——肯定价值”阶段的文化意识自然也大打折扣。

四、根柢未深的文化自信心态影响华侨学生的认同心理倾向

文化自信是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形成的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自信状态，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是一种质的提升与转型,多数情况下文化自信表现在2个层面:(1)建立于外在载体上的文化自信,依托于经济发展、技术革新等国家综合实力之上的自我肯定。(2)建立于内在发展机制上的认可倾向,是文化良性发展基础上的自信表现。

(一) 他者文化覆盖下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所属文化肯定与认可的心理状态,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形式。在跨文化环境里,主体在文化的差异对比中更易激发自我的文化反思意识,并通过不断的文化对比生成自身文化倾向。对于跨文化群体而言,特别是在他者文化下成长与学习的华侨学生,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心态就显得更为复杂与微妙。

我一直都比较喜欢动漫,包括现在也是,这可能跟我小时候在日本生活有很大关系吧。我觉得动漫可以带给我很多启发,而且很多生活中遇不到的东西都可以在动漫里感受到,所以我一直都喜欢看动漫,而且还有很多的动漫书。(日本华侨学生)

当从小侨居在日本的华侨学生谈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时丝毫没有掩饰对日本动漫的喜爱,并还饶有兴致地介绍了许多动漫人物的特点与周边产品,笔者由此追问他是否有比较熟悉的中国动漫形象,他的回答节奏明显迟疑。众所周知,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动漫也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追随者,这位日本华侨学生就是其中一位代表。

在他者文化覆盖下华侨学生中华文化自信心态的生成,本质上是两类影响要素交叠效果的呈现。从历史维度看,人们对自有文化的接纳与自信程度始终与国家发展态势以及综合实力密切相关。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直到明朝中后期我国国民都拥有着较高的文化自信心态,鸦片战争后遭遇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伴随着以先进科学技术为支撑的西方文化不断扩张,中华文化的存在感与影响力不断式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文化重新定位属于自己的文化坐标。但是,近代以来根植于国人心中文化自卑

感却非一日之功可以消除。在这种心态“惯性”下,特别是身处多重文化交织中的华侨学生,从内心深处很难直接生成对中华文化强烈的自信心态,甚至可能会出现文化自卑或文化焦虑的情况。从现实维度看,特别是在西方文化强势推进中,华侨学生的文化心态基础相对薄弱。在西方主流话语环境中,西方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是绝对自由化,“普世价值观”的探讨成为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有力助手,历史虚无主义被当做试图否定其他民族发展传承性与正当性的手段,“西方中心论”在文化维度上表现为“西方文化优越论”。因此,在中外文化交织的环境下,特别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裹挟之下,希冀华侨学生凭借自己的个人意识自觉生发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心态,显然缺乏必要的现实基础。

(二) 经济发展对比中的文化自信

全球化进程使得各国之间的移民规模持续增长,华侨群体的移居目的地也发生了较大转变。过去侨胞群体旅居海外一般是为了躲避战乱或灾荒,寻求更好的生活。时至今日,华侨华人的侨居原因往往是基于经济交流、贸易活动和技术移民等因素考量。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不再是乡愁基础上的归属感期待,而是四海建功立业自豪感的心理基础^[10]。华侨学生家庭移居海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条件,因此,对于经济发展趋势与经济环境的感受,华侨学生家庭是最敏感的群体,华侨学生对于经济水平的感知较之其他同龄人也更为敏锐。

我五六岁的时候去的加拿大,当时我爸妈已经在那边了,我过去跟他们一起生活。小学、中学都在那边上的学,我的朋友基本上都是那边的。本来我是打算去美国读书的,但是错过了一些机会和学校的申请时间,所以最后回来读书了。现在就是感觉很陌生,网络也没有那么方便,平时比较多跟留学生待在一起,可能以后还是会回去吧,薪资待遇也会比较高,我觉得发展平台会更适合我一些。(加拿大华侨学生)

华侨学生一方面敏锐感知着经济发展差异对自身生活带来的实际影响,一方面可能受到会将经济发展水平替代为对整体社会发展评价的误导,在差异化经济发展的对比中,特别是对于生活在欧美国家的华侨学生,可能无法从差异化的

经济发展中形成对中华文化的客观判断。即使是侨居在经济发展水平目前落后于我国的华侨学生,通过经济指标“滤镜”投射出的中华文化观念与文化情结,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聚焦”与“整合”,才能达到对深层次文化价值与内涵的了解确认。华侨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态度容易与中国经济目前在世界上的发展水平等同,对中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发展潜力可能存在一定认知偏差,从而无法真实形成对中华文化的客观判断。

(三) 科学技术较量里的文化自信

与经济指标类似,科学技术水平也是一种外显性较强的社会发展因素。科技发展的内驱力由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调整等综合要素共同构成,科技发展进程就像一台触发机,联动带来各方面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互联网媒体平台的发展、高科技产品的呈现、生活配套设置的完善都足以展现科技发展水平。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也都在日新月异的世界竞争中努力提高自己的科技发展水平,从未放松过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制高点的争夺。价值文化选择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的强弱方面,同样也体现在人们所拥有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方面^{[11][12]}。

就是中国媒体上面的一些东西,因为我在那边学的都是 Twitter(笔者注:现已改名为“X”),在国内没有用,你要“翻墙”才能用这个软件。但是这个(笔者注:网络资讯)更新得又比较快,就是真的要求它跟上,其实挺难的。(意大利华侨学生)

互联网发展是各国科学技术展示最集中的角力场,从意大利华侨学生的反馈看出,侨居国多样化的网络平台和更为成熟的网络发展技术给她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便捷,特别是目前她就读的广告学专业,互联网平台的使用以及获得资讯的便捷性成为她提升专业技能的重要助力,因此,她对目前国内互联网平台的发展表达了强烈期待。

目前,高校华侨学生基本属于“Z世代”群体,他们被称为互联网原住民,是成长于数字化时代的一代人,并且“享有高于其他年代人们的可支配资源,尤其是互联网资源”^[12]。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华侨学生容易将所谓的文化“优劣”或“好坏”程度直接对等于在使用互联网时所

感受到的科技体验与适用价值,将自己对文化的认知建立在以衡量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上,由此成为对文化价值与内涵意义做出判断的依据。虽然随着全球信息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已经将世界日益连接成一个地球村,其中的“村民”同步共享信息资讯,但文化网络的搭建与文化要素的分布在全球范围内至今依然无法做到均等共享。“持久的文化自觉,其所造就的可能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显然是以物质和技术的发展为前提的,也就是随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物质环境的极大丰富以及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所必然出现的对于文化自觉的一种实际诉求”^[13]。文化发展与科技水平具有一定关联性,二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但二者的发展进程并非同步。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本身代表着一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互联网运行方式、运行速度以及人机交互的便利性等都直接体现着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目前我国国家互联网的发展与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客观反映文化内涵与发展的真实情况,西方文化凭借发达的互联网技术与平台搭建,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且强势地输送西方文化价值观,他们的受众正是以“Z世代”为主体的青年群体,就是即将成长起来的未来社会主导力量人群。

五、结 语

斯威德勒文化“工具箱”理论强调文化主体从“工具箱”中选择不同的文化“工具”进行“行动策略”建构,本质上个体的文化认同是具有明显的选择性与工具性特征^[14]。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调研发现华侨学生群体基于特殊的成长历程与文化经历,形塑了他们在“文化休克”、文化自觉以及文化自信三方面的文化属性特征,形成了既有别于国(境)内学生群体又区别于华人留学生群体的文化“工具箱”,这对华侨学生未来的行动策略模式形成将产生决定性影响。文化认同的生成是一个渐进过程,厘清文化认同基础构成及其现状是开展文化认同研究的必要性前提,主体的文化属性是在长期实践经历中形成的稳定文化特征,这是构建文化认同

需要尊重的基础性前提。本研究阐释的华侨学生文化认同的基础性特征，将作为阶段性研究成果为后续开展的高校中华文化认同教育路径研究提供实证参考。面向华侨学生构建中华文化认同意识，将他们培养成为在国际范围内弘扬中华文化的有效传播者，自觉拥护祖国和平统一的坚定爱国者以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设友好国际环境的积极建设者，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责无旁贷的育人目标，也是高校承担统一战线工作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安·斯威德勒. 行动中的文化：象征与策略 [M] //周怡. 文化社会学：经典与前沿.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3] 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N]. 人民日报，2023-03-20（1）.

[4] OBERG K. Cultural shock: 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s [J]. Practical Anthropology, 1960（7）:

177-182.

[5] 郝红英. 埃里克森与毕生人格发展 [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

[6]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2.

[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8] 杨清媚. “文化”与“文化自觉”辨析：论费孝通的文化理论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66-74.

[9] 贝理.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与应用 [M]. 3版. 常永才，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10] 韩震. 全球化时代的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特点 [J]. 学术界，2009（2）：50-60.

[11] 邢媛. 文化认同的哲学论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2] 潘树琼. Z世代：伴网而生 活在当下 [J]. 网络传播，2020（4）：32-33.

[13] 赵旭东.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费孝通文化观对文化转型新时代的启示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8-29.

[14] 刘燕玲. 当代海外华人的双重文化认同特征探析：以美国华人为例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3）：45-53.

A Qualitativ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WANG Lei^{1,2}, HU Xuesong³

- (1. School of Marxism,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3.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Engineering,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have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of China. An education system that satisfies overseas Chinese is always an effective way for universities to undertake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the state United Front.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foreign students of Chinese origin or Chinese students, considering their specific nationality attributes and unique growth experiences. Based on Ann Swidler’s cultural “Tool Kit”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imed at providing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furthe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universities in China;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basic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 张永汀)